

AIZUOJIAZIXUANCONGSHU

·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



秦兆陽小說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当代作家自选丛书

秦兆阳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封面题字：何应辉

插 图：秦兆阳

秦兆阳小说选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5.625 插页 5 字数334千

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8,600册

书号：10118·584

定价：1.46 元

出版说明

收在本集的作品，是著名作家秦兆阳的精心之作。作家善于追求，喜爱探索，不管是歌颂生活中的美，还是鞭挞一些丑的东西，都有着自己的创见。他的小说结构严谨，语言朴实，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表现了作家纯熟的艺术技巧。

秦兆阳

自序



从很小的时候起，故乡的父老们就给我起了个“板大先生”的绰号。板者，古怪也，遇事爱咬死理和不通常理也。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仍就本性难改。比如，我是个搞写作的人，却不愿意自己认为是作家，也不喜欢别人称我为作家。如果一个人必定要有一种头衔的话，我倒觉得“衔”我以“编辑”二字更为恰当。在战争年代就断断续续当过画报和报纸的编辑。一九四七年正式走上文学工作的岗位，就开始正式担任文艺刊物的编辑，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年当中只有两年间歇。此后是因故失掉了当编辑的资格好多年。从一九七九年春天开始，仿佛是“法轮妙转”，当我获得新生时，又投入到编辑群里了，直到今天。看稿、改稿、退稿、编稿、谈稿、约稿，总起来或者可以名之为“磨稿”——是对稿件切磋琢磨之意。我这本书里的小说，大约有一半以上是在编辑工作的业余时间写的。所以我有一个想法：与其说它是一个普通作者的

《产品选集》，倒不如叫它是《编余创作选集》。

二

从本性来说，我由衷地愿意对生活唱赞歌。即使是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也愿意为了赞颂正面事物而处理矛盾。这原因，说起来根源深远，却很自然，最初并非来自甚么理论指导。

在旧社会里我是个几乎不能生存的人，也看到过许多劳动人民如何挣扎于穷苦的命运之中，更看到过亲爱的祖国经历巨大的危难。所以在参加革命以前的学生时代，当我开始在报纸上发表一些不象样的诗歌时，就自然而然地宣扬过爱国思想。以后，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给我以光明，昭我以真理，亲我以人民，练我以战争，溶我于时代，引导我走进了胜利以后新的中国，使我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内心的寄托，所以我心里总有一股火热的味儿。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直到现在，正在走向孔老夫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之年而不愿意力争在工作的选择上从心所欲的原因，虽然我在脑力、精力和眼力上早已不能从心所欲。这也就是直到最近一年以前，我的作品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对生活的赞颂的原因，虽然赞歌的曲调和嗓音都不动人。从战争年代一开始学写小说就是如此，那时我在敌后根据地，还不知道延安的文艺整风，也未见到毛主席的《讲话》。

一九五三、五四年，我得到了回到战争年代老根据地去生活的机会，看到了经过艰苦斗争和重大牺牲以后的农村欣欣向

荣的和平生活景象，于是从心里“流”出了十几篇《农村散记》（这是五十年代出书时用过的书名，现在大部分选进了本书的第三辑）。既近于散文，又类似小说；或有头无尾，或似无结构；意在试探着与当时颇为流行的写法略有不同。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和同一地区，看到了农业合作化的趋势，于是在五五年冬天完成了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也许《农村散记》确实是为当时有的评论者所说的，反映矛盾冲突不够，牧歌情调较多。但我欢喜，或者说我愿意学习探索生活中美好的、诗意的、使人油然而喜的东西，愿意使得读这些作品的人们去热爱生活。我觉得，引人热爱生活，使人们在平凡的生活里看到美和喜悦，这本身就可以是作品的主题。这种看法直到现在仍然常常作用于我的思想。

也许《在田野上，前进！》这本书里所表现的、“合作化搞得快一点才好”的思想不一定完全对头（当时写的是初级社的合作化），但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书中所触到的、几千年来个体小农经济给予农民的束缚和痛苦，那种不自觉其为束缚的束缚，不自觉其为痛苦的痛苦，以及部份先进分子对于改变这种现状的要求等等，是有生活依据的。

以后，在个人最苦闷，国家最困难的时候，写了短篇小说《一封拾到的信》。是试图写一个具有“诗意的性格”的姑娘，是把我自己在当时处境下的某些难以言说的思想感情溶到一个女孩子身上去了，虽然我今生早已注定了是个男性，而且那时正在走向“知天命”之年。一九六三年开始写长篇小说，当时暂定名为《两辈人》，曾在《广西文艺》上连载十余万字，后因“史无前例”而中辍。是试图表现燕赵慷慨悲歌之士

的风格，人民群众不屈不挠的气质，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潜力。后来，在间歇了十余年之后的一九七八年，虽然对我的批判之声并未因“四人帮”倒台而有所断绝，个人的苦闷之情因之仍复深刻，但天安门事件及“四人帮”的毁灭又使我因时代的转机而无限兴奋，于是写了中篇小说《女儿的信》以及《心的歌》、《悼贺龙》等散文和诗歌（有些诗歌没有发表），是想以自己的乐观兴奋之情去激励遭受了十年浩劫以后的人心，是试图表现具有当时时代特色的真实，是想表现民族的生机和人民的希望。《女儿的信》里的那位老干部是有真人真事为依据的。直到现在，我仍然常常由于看到我们的国家有许多这样的老人和新人，许多这样的民族脊梁骨，而受到鼓舞和增强信心，因此在日常的编辑工作中我并没有忘记尽可能组织和发现这类鼓舞人心的作品。

用朴素的形式去抒发从生活中感受到的诗意之情，优美之情和不灭的生机，这是我长时期以来所喜欢、所追求的写作的路子，是从自然的、不自觉的状态逐步走向比较自觉的状态，虽然我一直远没有做到“如愿”的程度。但长期以来，我觉得只有这样写才是一种快乐，一种享受，一种感动，而且也才写得畅快，所以我暗中自称为“笔下流情”之路。

三

我有时间自己：为什么要喜欢文学艺术？得到答案总是：最初的“基因”是喜欢创造性的活动。幼年和少年时候喜欢绘

画到了入迷的程度，对其他创造性的游戏也同样容易欢喜得入迷。学生时代的家庭遭遇使我只能幻想依靠自己的绘画技能去谋求未来的生活出路，于是这种创造性的兴趣与自己个人的实用需要结合起来了。参加革命后，这种兴趣又与革命的实用需要结合起来了。一九四三年秋，我主动要求到冀中平原的“平、津、保三角地带”生活。当时这里是冀中平原上敌我斗争最残酷的地区，丰富的生活使我感觉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深入生活肌理的民主革命，是多么惊人！要靠美术的形式去反映这样的现实是不可能的，于是下定决心从头开始学习文学写作。这当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仅仅是“南蛮子”要学会用河北农民的语言来写作这一点，就曾经下过不小的功夫。是很大的创造兴趣与革命需要相结合给了我以毅力、乐趣和鼓舞。我所说的“笔下流情之路”，最初就是从这里开始“自觉”的。战争是残酷的，但残酷之中有兴奋，有欢乐，有高尚的理想和英勇的精神，这都是存在于人民日常斗争生活中的诗意和美。十分可惜，直到今天我仍然无力把战争中的这些生活情景写出来，没有实现那最初的愿望。

四

然而，历史的风云变幻有时是出人意外的。虽然，早在战争年代我就朦胧地觉得只应该做一个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不应该以“作家”自居；搞写作虽然有创造的乐趣，但不一定总是那么幸运；虽然解放以后这种感觉日益明显；但无论如何

没有料到，这不幸的变化竟来得这么严重而且深沉！

“听说你所写的《农村散记》和《在田野上，前进！》都是假的，你在生活里并没有真的经见过那样的事情……”——一九五八年春，当我正在被“变”的时候，一位领导同志这样问过我。他的“听说”，无疑的是由于有人想帮他解决把我由正变反的矛盾。这一点，是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的。当时我却板气十足，竟认为这是一个无须回答的问题。难道写小说必须写真人真事吗？却丝毫也没有想到，我当时的默不作声，竟使得这位本想替我辩护或本想启发我去为自己辩护的领导同志无能为力。顺便再说几句：也就是这位领导同志，在主持批判我的会议之前的几天，曾经说过：“我看你的这篇论文没有什么问题嘛！”这论文就是指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说这话时他的沙发桌上正摆着这篇文章。我想，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位理论家的他，后来没有写文章参加那场大批判的主要原因吧？可悲的是，若干年后，文艺界这位温厚的长者竟在“四人帮”的迫害下也同样无法为自己辩护而与世长辞了！要知道，在当时的气氛下他能说那样的话是很不容易的。

我所得到的教训是：要从事文学这一行，必须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去观察一切；必须认真地全面地看别人和看自己，如果看准了，就要坚信，不要对人对己犯片面性。当然，要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书生气十足的板大先生无疑是会摔跤的。

五

那么，使我“变”的主要根据——我的那篇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其用意果真是提倡“暴露黑暗”吗？我想文章仍可考察，而且近几年来已被许多同志考察过了，这里就不去说它。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它跟我以上所述的创作实践的路子并不矛盾。我想，趁现在这样的机会来稍稍作一点表白，也是必要的。

那么，在一九五六年，我在编辑工作中为什么经手发表了一部分所谓“干预生活”的作品呢？是否可以据此为由来怀疑上述我自己创作实践的路子呢？是否可以说这是跟我那篇论文的中心主张相一致的呢？我想，只要翻阅一下当时主要的文艺理论刊物，对当时的文艺思潮作一回顾，就可以知道，这种“干预生活”和“反映矛盾冲突”的思想是从何而来，它跟我那篇论文决不是互为注解的关系。

那么，我为什么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篇“干预生活”的短篇小说《沉默》呢？

如果说《农村散记》中的十几个短篇小说大部分不是以具体的真人真事为根据的，那么，这篇《沉默》倒确实基本上写的是一件真事，而且倒真的是五三——五四年在农村中听到的。其所以直到五六年冬天才把它写出来，一方面正好说明我的写作兴趣并不在这样的题材上；另一方面是受“干预生活”思潮的影响；还因为当时为了提倡真正“短”的短篇小说，要

在《人民文学》上编一个特辑，就自己写了一篇凑数。现在看来，这篇在艺术上不象样的小故事，对于十年浩劫中“四人帮”的罪恶，倒多少有一点“不幸而言中”的意味。这是我在一九八一年以前所写的，唯一的一篇所谓“揭露阴暗面”的作品。

六

在一九八一年的今天，我却真的写了几篇带有一些“批判”意味的小说。这决不是赶时髦，是十年浩劫、极左路线、以及封建传统对于生活的影响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不有所反映心里不得安宁，而且多少年来又脱离了其他方面的生活，接着写未完成的长篇小说《两辈人》，又因事多而定不下心来。但写这类“调子”的东西又毕竟不合我的兴趣和习惯，文笔就长时间转不过弯子来，构思也比较困难，思想角度和分寸也不易掌握，所以直到今年才动笔，而且自己也不满意，也没有以前写那些“牧歌味”作品时那种说不出的愉快之感。

这几个短篇中，只有《孙猴求雨记》写得比较早，是一九七八年冬天的产物，也只有这篇东西给了我一种海阔天空的创造性的喜悦，但有的朋友看了觉得它有点怪，所以我想专门为它说几句话。

《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创造了孙悟空这个举世无双的艺术形象，却无法给这个形象以合理的归结，只好让他到西天去当活死人。我从童年时候看《西游记》皮影戏，到少年时候读

《西游记》小说，对此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遗憾之感。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是何等深刻。于是我动了为孙悟空“翻案”的念头。然而我又毕竟改变不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于是，孙悟空只好逃到巫山云雾之中去求得模模糊糊的生存，在必要的时候也替人民做点好事。我是设想，即使玉皇大帝或如来佛派天兵天将来捉拿他，他会化成一团若有若无的雾气而跟周围的空气混合起来，道法和佛法总不能把天下的空气都拘禁起来甚至加以消灭。

神佛的经典要义及其虚构的法力权威，终极目的是要把一切生机，甚至把整个人类，变成死寂无为的废物和废墟。孙悟空却是个生气蓬勃的性格（所以神佛要用八卦炉烧他，五行山压他，紧箍咒拘他），我想，也许可以把它看成是想要反抗这种恶势力而又终于无能为力的悲剧形象。于是我就把冷到了极点的南极仙翁描写为绝灭人性的封建宗教的代表人物。时至今日，难道我们还不应该给孙悟空翻案，并且指出南极仙翁之流的末路，以增长人民的志气吗？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精神，以达到改造世界和掌握自己命运的目的，应该是我们为之而奋斗的最高理想。

七

二十年来我被说成是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的提倡者，事实上，一九五六年我写那篇现实主义的论文时，对于文学艺术批判性的功能在认识上还是非常模糊的。经过了这几年文艺界

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践以及自己的思索，在认识上似乎反倒明确了一些，这里不妨顺便说一说。

如果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只有歌颂的属性（或任务）而不应该有批判的功能，那将如何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如何从多方面提高人们的心灵，引起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和思索？如何借文艺之力促使旧事物的灭亡，帮助新事物的成长？“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将怎样革命？社会主义高度的精神文明将如何建立？如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一建就成，连人们的思想意识也一下子就全都变得完美无缺；或者，即使明明知道并非百事完美，甚至预见到这种不够完美有恶性发展的可能性，也要对这一切隐而讳之，不需要进行任何形式的批评斗争，包括运用文艺的武器去进行分析批判；那么，那些已经取得的成果（包括思想建设方面的成果）岂非有可能停滞不前？那些消极事物岂不是可以自由发展？那些尚未取得的成果又将怎样去排除前进的障碍？再扩大言之，如果人类从来就没有批判的要求和能力（包括用文艺的形式），则人类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斗争如何进行？那么人类还有今天吗？还有更加美好的未来吗？特别是我国在经过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以后，其遗患至今仍然在生活里起着一定的消极作用的时候，文学艺术如果闭眼不去正视这样的现状，不去有助于人们在思想上识病症、辨是非、肃流毒、找教训、树正气、除障碍、那么，文学艺术能够符合时代和人民的要求吗？

当然，我绝对不是强调文学只应该有批判的功能（我也绝不是把“批判”二字视为只是一个消极性的概念，这一点后面还要谈到）。如果没有对于美好事物，没有对历史和生活中心积

极因素的歌颂、继承和发扬，社会也是不能前进的。如果生活本身不可爱，不值得留恋，没有改进的希望，人类早就会用自杀的办法把自己消灭了。真理，美，诗情画意，本来就存在于生活中。即使是悲剧，如果它能够长期激动人心以至于流传不朽，其中必定也有沁人心脾的真善美的因素。

无数的民间传说，例如《天仙配》、《天河配》、《阿诗玛》、《白蛇传》等等，都是劳动人民从生活的真善美之中提炼出来的故事，它超脱了生活本身的平庸性，因而能够震慑和净化人们的灵魂。我国近数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多么震撼人心的诗篇啊！我们的文学艺术的成就比起这部波澜壮阔的诗篇来，是多么不相称！我的那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的中心意思，难道不就是提倡从生活实际和创作规律出发、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努力提高认识生活和反映生活的能力、扩大艺术探索的道路、热切地希望文学艺术能够达到无愧于伟大的现实生活吗？

把文艺的歌颂和批判两种功能机械地分开，常常会形成对许多作品解释不通的情况。批判与歌颂常常是在一部作品里以辩证的关系互为因果、互相衬托而存在的，当然也不能否认一篇作品常常有某种总的主导的倾向。

有的作品当时看来，或由某一部分人看来，的确是社会影响好或不好，但事过境迁，各种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以后再回头来看，也许以前被认为好的倒成了废品，也许以前视为坏的倒有震慑人心的积极作用。所以衡量作品时不要轻率从事，不要眼光太短。

“反映矛盾冲突”与“批判”这两个概念之间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决不是同义语。批判并不等于否定，有时甚至是为

了肯定所想要肯定的东西。“批判”与“暴露”也不是同义语。一般的暴露也不同于狠狠地指责和揭发。艺术的社会功能与一般的功利主义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更不能跟浅薄的实用主义相等同。

要做到头脑健康、认识准确、思想深沉、心地光明。

要做到既能正视矛盾和深刻地反映矛盾，又能够很真实、很自然、很富有感染力地给人以希望和信心。

要做到引人思考，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和思想水平。不是就事论事的“真实”，而是艺术概括与凝练的真实和超脱于平庸凡俗的真实。要能够给人以艺术享受。

所有这些，都跟单纯的暴露和浅薄平庸的歌颂截然不同。

我们是要反映“自己”的社会生活，是应该爱护它、促进它、而不愿意伤害它的社会生活，然而它又出现过那么大的不应该出现并且十分令人痛心的事情，于是就发生了“自己”与“异己”之间，个别的生活经历与整个时代趋势之间，当前现状与过去历史之间，政治与艺术之间，暂时利害与长远利害之间的种种难以处理、难以对待的关系。

如果不是年龄和精力的限制，我仍然愿意到那热气腾腾的地方去生活较长的时间，再一次投入到既有矛盾冲突又具有“诗的情调”的写作中去——那才是我最大的幸福。

八

以上可以说是对自己几十年从事文学工作的道路作了一个

简略的回顾。我忽然发现，这几十年竟是在许多矛盾中走过来的。搞写作而不愿意以作家自居；一直不愿搞编辑工作却一直在搞编辑工作，甚至就是在编辑工作上摔了很重的一跤也不后悔；本来是个搞创作的人竟被人认为是搞理论或搞评论的人；自己确实不愿意搞理论，也自知学识基础极差，“理论水”很少，麻烦性也很大，但又常常被环境推着在理论的圈子里打转；明知干文艺这一行有种种极难克服的困难，却非在这条难走的路上跋涉不可；已达衰老之年，却仍有“板大”之性……

努力做一把铺路的泥土吧！

来自泥土的故乡，吃泥土生长的粮食长大，后来又是革命给我以寄托心灵的泥土，而革命又需要我把生命变成泥土。在世界上，被人们认为最平凡，最卑贱的东西是泥土，然而没有泥土就没有世界，没有一切。也许有人认为泥土是香的，也许有人认为泥土是臭的，也许有人认为只不过是一股泥土味。到底是香是臭还是什么别的味，泥土自己不去管它。把最臭的粪便撒进泥土里，久而久之，粪便也被泥土变成了泥土，并且能够生长五谷。啊，真正使自己成为一小把泥土，并不容易，所以必须努力——即使是努力，也只能做到可以用来铺路的程度——而且只有那么小小的一把。

文学的史实说明：必须有无数的泥土和无数别的材料，才能筑成坚实的道路，才能通向未来，才能给千百万人以行走的便利，才会在路面上出现巨人的足迹。